

## 目 录

###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论

1.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其影响 ..... ( 3 )
2. 我国古代用人之道 ..... ( 8 )
3. 秦汉管理实践对企业家的启示  
——历史与企业家对话之一 ..... ( 41 )
4. 白圭经营管理思想补说 ..... ( 57 )
5. 《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 ..... ( 65 )
6.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 ( 71 )
7. 我与来辉武对话始末 ..... ( 75 )
8. 读古书之乐 ..... ( 79 )
9. 再谈历史与企业家对话 ..... ( 82 )

###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论

10.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纵横谈 ..... ( 101 )
11.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与当前人事制度改革 ..... ( 116 )
12.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研究现状述评 ..... ( 151 )
13. 我国历史上的“储才”与第三梯队建设 ..... ( 165 )

史论

- 14. “史学危机”刍议 ..... (185)
- 15. 时代呼唤通俗史学..... (195)
- 16. 广义史学说..... (205)
- 17. 21世纪史学应当更多地关注自然史研究 ..... (209)
- 18. 21世纪中国史学与国际合作——在中国史学界  
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学术研讨发言..... (213)

论陈直之学

- 19. 陈直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 (219)
- 20. 论陈直先生的《史记》、司马迁研究 ..... (230)
- 21. 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纪念陈直先生  
逝世 20 周年暨诞辰 100 周年 ..... (241)
- 22. 陈直学述略——为纪念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成立 20 周年而作 ..... (251)

周秦汉唐论

- 23. 周六遂“兴咎”试释..... (265)
- 24. 试论春秋战国秦文化的走向..... (272)
- 25. 战国后期秦的职官与选官制度..... (286)
- 26. 汉唐历史的魅力..... (303)
- 27. 汉唐文化及其与世界的交流..... (312)
- 28. 汉初黄老政治发微..... (356)
- 29. 以刘秀为例辨析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370)
- 30. 隋唐时代的精神风貌..... (375)

31. 文明·中国古文明·周秦汉唐文明…………… (389)

#### 书论及其他

32. 一部颇具特色的秦汉史专著…………… (409)
33. 察举制研究的重大突破——读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415)
34. 古史探索的新收获——读《周秦社会结构研究》…………… (423)
35. 陈直《读金日札》评介…………… (426)
36. 一部断代地方史的力作——读《湖北通史·秦汉卷》…………… (433)
37. 以史为鉴 古为今用——《中国科举制度研究》评介…………… (436)
38. 秦史研究的填补空白之作——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读后…………… (439)
39. 《秦简日书集释》序——探索秦简《日书》奥秘的向导…………… (443)
40. 《秦汉仕进制度》再版前言…………… (447)
41. 《秦汉社会文明》再版前言…………… (450)
42. 《陕西通史·秦汉卷》绪论…………… (452)
43. 《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发刊词…………… (464)
44. 《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二辑卷首语…………… (466)
45. 《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三辑卷首语…………… (468)
46. 《秦汉历史文化论稿》重印后记…………… (470)
47. 《古都西安·汉武帝》前言…………… (472)

## 传统历史文化散论

---

- 48. 从秦俑馆说到秦史研究——秦俑博物馆 20  
    周年馆庆寄语..... (477)
- 49. 近十多年大陆秦汉史研究述评..... (487)
- 50. 秦史秦文化研究的世纪回顾..... (521)

## 自序

这册《传统历史文化散论》，是2002年出版的拙作《秦汉历史文化论稿》的姊妹篇。

本来，这两部书计划编作一册，拟取名《浐水集》——因为这些文字皆写成于西安东郊浐水之滨，故名。后来由于参与筹办一个学术研讨会的特殊需要，先行将有关秦汉历史文化的文稿37篇编为一集付梓；复又把其余的文章另编为一集，即本书也。先出的文集之所以选取37篇文章，隐含着一种纪念意义。因37岁时，我开始师从陈直先生专治秦汉史。而在这37篇当中，有一篇《读云梦秦简札记》实由四篇小文组成，所以全书文章总数应为40篇。这也是特意安排的，即表示40岁时我正式在西北大学供职做助教，由此拉开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帷幕。这种以数字暗隐某种特殊含义的做法，是中国人的癖好，从秦始皇到今天，似乎大家都喜欢这么做。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很难免俗，于是乎如此这般一回。不过，在这本书中却没有此类微言大义，文章的篇数纯属自然选取的结果。

我自幼喜爱文史，后虽曾一度弃文从理，但毕竟没能摆脱文史的旧情，最终还是学了文科。可能是较多地受儿时所读《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红楼梦》一类作品的影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仕途，充分地不感兴趣，而只是希望将来能在学术研究领域一显身手。大学时，我读的历史专

业，应该说是遂了自己的心愿；然而大学毕业后的十多年间——这是人生一段最宝贵的年华，由于极左思想肆虐时代社会条件的制约，我却始终从事着与个人心向往之的学术研究毫不相干的工作。拨乱反正之后，我有幸归队，重操旧业（我将此戏称作“死灰复燃”），但可惜已经年过不惑，故而只好任凭兴趣的驱使，随着际遇的变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这样积二十余载，慢慢也取得了些点滴进步，在秦汉史学界算是略为人知。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的研究领域相对集中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方面。其缘起颇具偶然性。记得那是一次陈直先生给我们讲授汉代孝廉选的新史料问题之后，布置了一道《试论东汉举孝廉制度的利弊》作业题。我按题写了一篇小文呈上，先生阅后认为不错，遂推荐给《西北大学学报》发表（见 1980 年第 2 期）。这使我很受鼓舞，于是便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探讨研究。当时有一种潜意识对我的研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即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个漠视仕途的人去研究选官制度，可能会更客观更公正些。如此不久又撰成《秦仕进制度考述》一文，在颇有影响的史学杂志《中国史研究》上获得发表（见 1982 年第 1 期）。此后，我就一直围绕着这个题目做下去，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于 1985 年出版了一部断代的研究专著《秦汉仕进制度》。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此书出版后很快就在学术界，特别是在海外同行专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称赞为“杰出的研究”。后来我又陆续见到包括权威的《历史研究》在内的多家杂志所刊论文以及多种学术专著对此书的广泛引用。一部史学专著，能够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应该说是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尽管它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失）。在此基础上，我又上下延伸，于 1989 年出版了通史性的《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一书。至此，我在这个专题的研究上，

完成了由一篇专论秦的论文，到一部断代专著，再到一部通史性专著的三级跳式发展。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正式出版之前，我曾将其主要内容凝缩为一篇题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纵横谈》的万字文章，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上，同年第11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此文，使之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后来该文又被选入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二册，题目叫做《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由于我的工作与中学教育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相当一段时间里家中也没有中学生，所以对此事一直并不知晓。多亏新分配来西大的一位博士告诉了我有关情况，并将那册教材送到我手中。翻开一看，才知道书中文章的作者，既有毛泽东、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朱光潜、巴金、茅盾、秦牧、刘白羽、何其芳、钱学森等现、当代名人，也有王维、韩愈、柳宗元、苏轼、司马光、陆游、罗贯中、曹雪芹、方苞、龚自珍、梁启超等古代、近代杰俊，还有泰戈尔、契诃夫、普希金等外国文豪，而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名字竟与他们并列在一起，着实令自己深感担当不起。从版权页所标的印数可知，这部教材几十万册、几百万册乃至上千万册地传播于广大中学生中间，在他们青春的心灵中或多或少留下某种印象。如此一种社会效应，确乎也是我连做梦都不曾奢想的。

在从事选官制度研究的同时，我又开辟了第二战场：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此事的起因，同样具有相当的偶然性。这还需要从中央组织部1986年夏召开的第三梯队建设理论研讨会说起。原来这次研讨会有一项内容为“中国古代官制借鉴”，会议筹备者广泛动员组织全国从事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为之撰稿，我亦奉学校之命为研讨会提供了一篇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储才”与第三梯队建设》的小文。不想此文颇得

会议主办者的好评，不仅选为大会交流论文，而且还特命作者莅会做大会发言，并在《领导科学》杂志刊出的研讨会论文专辑中（见该杂志 1986 年第 9 期），作为“中国古代官制借鉴”栏的惟一文章发表。就在这次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虞祖尧教授。在他热情的介绍下，我参加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省称“古研会”）的学术组织，由此开始了对古代管理思想的学习与研究。

在古研会里，我有幸结识了许多经济学界、管理学界以及企业界的前辈和朋友，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新知识、新学问，从而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不过，我研究古代管理思想的路子，颇有点与众不同。也许由于我是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缘故，所以我始终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去研究古代管理思想的，而不仅仅把它当作是一个单纯的管理学问题。在我看来，古代管理思想研究，应该是历史学与管理学交叉渗透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问。经过数年探索，我终于找到了一句通俗而形象的话对这门学问加以概括，这就是：历史与企业家对话。1990 年，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上，我首次提出了有关对话的观点，并得到包括古研会领导在内的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

就在学习、研究古代管理思想的同时，我把学习的心得及研究的体会又引入教学活动，在所供职的西北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选修课。选课先后开了两次。听课者不仅限于历史、中文、经济等文科院系的学生，而且还有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地质、地理、生物等理工科院系的学生。其人数之多，兴趣之高，大大超出预料，并且皆经历了因人太多而三换教室的过程。听课者普遍反映：闻所未闻，学所未学，大有收获。后来，我以两次选课的讲稿为基础，采用对话体的形式，撰成了一本题为《历史与企业家对话》的小册子。在此书

交付出版之前，我先在《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同名的文章，以投石问路。不想很快就收到了一些热心读者的来信，对“历史与企业家对话”的提法表示极大的赞许，并鼓励我以此为题进一步写出一部专书来。有了这些反馈的信息，我的底气就更足了。1993年初，这本对话体的小册子正式面世（版权页所标出版时间为1992年12月）。它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从我所知与亲历的几件事情上，似可窥见一斑

其一，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1993年9月9日发表评论，称《历史与企业家对话》“为历史学作了新的开拓”。指出“作者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某教授和某厂长对话的形式，生动具体地阐述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精华”，“无论是大企业的经理，还是乡镇企业的厂长，只要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他们一定会得到有益的启示”；“中国的学者不必妄自菲薄，中国的企业家也不必舍近求远”。

其二，《光明日报》理论部《史林》主编马宝珠女士给我来信讲：“《历史与企业家对话》我已拜读，非常钦佩您的眼光、见识及与时俱进的精神”；“由此我考虑到一个题目，即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其影响（当然文章标题可再考虑），想请您撰写”；“另外，我还有个想法，在《史林》上搞个‘历史与企业家对话’栏目，将您书中所述内容选择一些刊登出来，各个问题独立成章，文末后注序号，连续发一些，您看如何”。后来，约写稿子一事兑现了。我按照马女士拟的“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其影响”题目写了一篇小稿，作为《光明日报》新推出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专栏文章，发表在该报1994年7月18日《史林》版的显著位置上（此文后被《新华文摘》同年第11期全文转载）。而连载《历史与企业家对话》之事，却因西大出版社总编的不合作，未能实现。在此情况

下，马主编只好另行策划了一个类似于“历史与企业家对话”的新栏目——“史学家与企业家对话”，并于1995年春天推出，先后发表了十二组史学家与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总裁）的对话，在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论坛上掀起了历史与企业家对话的高潮。就在此专栏最后一组对话发表后不几天，《光明日报》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学术研讨会，邀请参加对话的所有史学家与企业家聚集京华，一方面对这次对话活动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则在这次对话的基础上就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再作深入的探讨。研讨会结束次日，《光明日报》即发表了会议的报道；不久，又发表了有关这次研讨会的长篇纪要。这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可以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与《历史与企业家对话》一书有着某种因果联系；它在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的印迹，或可视为《历史与企业家对话》一书所产生的社会反响之缩影。

其三，一次我去广东某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归途中在中山大学稍事停留，与某校一教授相处，彼此还感到投缘，于是便比较展开地来闲谈。此公眼光很高，被他看好的学人十分有限。交谈中对方却特别郑重地向我推荐他新近买到的一本书，称赞此书如何如何有远见卓识，是他近期读到的一部高水平的好书等等。不想此书正是《历史与企业家对话》。原来《对话》出版时，我署的是笔名“刘铢”。对方万万没有料到，《对话》一书的作者就是坐在他对面的黄某人。“刘铢”者，“留珠”也。经我捅破这层窗户纸之后，双方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综上所述，应该说，《历史与企业家对话》一书的社会反响是积极的，许多地方皆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至于说由此书倡导的历史学与管理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学术方向所具有的巨大学术生命力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学术影响，从十多年后《三联生活周刊》（总第339期）登载的一则广告上似乎可以看

得相当清楚——

广告发布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层管理者培训与发展中心

广告总标题：从历史看管理

广告文字：（均依原格式抄录，“其一”、“其二”、“其三”为引者所加）

其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历史学系强强联手  
联袂打造高层经理工商管理硕士系列课程之  
从历史看管理

细数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浩荡历史之管理哲学  
赋予当今高层经理叱咤商场风云之制胜法宝

其二

中国历史浩浩荡荡已走过数千年。历史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绚丽而华美的故事，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刻思想。历史学与管理学的紧密结合，必将为企业家提供一个思想盛宴。从历史的角度，借管理学的工具，从思想、制度、领导人三个层面，并结合当今中国商场上的实际，北大名师为您点评王者之成败，剖析商家之得失。这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历史系联袂推出的高层经理工商管理硕士系列课程之一——从历史看管理。

其三

课程设置

思想系列：“儒墨道法与企业经营”“传统商业思想与商业实践”“中国企业的战略思维”“从本土走向国际”。

制度系列：“中国古代的官僚等级制度：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迪”“中国古代的君位继承问题：对现代企业接班人选择的启迪”“中国古代国家权力运作机制：政府管理的历史

经验与教训”“效率与秩序：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集权与分权”“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现代企业中总公司与分公司关系的启迪”“董事长与总经理：中国历史上皇帝与宰相的关系”“中国古代官员的管理制度：对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的启迪”“官僚机构的制衡器：历史上的监察制度”“公司治理”“有效的组织管理”“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领导人系列：“皇帝的成功与失败：秦始皇、汉高祖刘邦、唐太宗与唐玄宗、清朝康熙与乾隆皇帝的用人行政”“企业领导艺术”。

请看：这岂不正是历史与企业家对话吗？……

我在以上两个领域的研究，构成了本文集的前两项内容：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论”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论”。

“史论”是本文集的第三项内容。

诚然，我不是专门搞史学理论的，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研究。但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总得对自己研究的对象及所从事的专业有一定的认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史学危机”刍议》一文，应该说原则上表达了我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我虽是危机论者，但却不是悲观论者。我深信，通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个生机勃勃的史学新时代必定会到来。在21世纪初的今天，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新时代的曙光。至于史观，我是十分赞成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被删去的那条注文的想法的：即认为历史由人类史与自然史两部分组成，人类史与自然史密切相连相互制约。对于这样的史观，过去我曾称之为广义史学，后来则称之为大历史、大史学。为了贯彻这种大历史史观，我坚持在自己所主编的学术年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上，每一辑都发表一定比例的自然史研究的文章。我甚至还曾向我所供职的学校领导建议，将我校的历史学科进行新的整合，建立包括自然史研

究在内的大历史学科。当然，我也深深知道，这种看法是同史学界的主流认识相悖的。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多数史家是把历史仅仅看作人类社会史的，就连影响极大的年鉴派也曾明确表达过历史只是人类史的观点，而我却偏偏坚持历史除了人类史之外，还应该包括自然史。这岂不是明显与潮流不合节拍吗？！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反一反潮流，未必就全然是件坏事。何况这总归还应该是一个学术问题，需要用学术研讨的办法去解决它。即便是有朝一日取得了某种共识，也应该允许保留不同意见。

“论陈直之学”是本文集的又一项内容。

陈直先生是我的授业导师，学人尽知的现代著名秦汉史学家。先生治学承继并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鲜明地提出了“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学术主张，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一代宗师。日本已故著名学者大庭修博士出于对陈先生的推崇，率先提出了“陈直学”的概念，但遗憾的是他对陈直学的具体内涵却未遑论述。在纪念陈直先生逝世十周年暨诞辰九十周年时，我发表的《陈直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一文（《人文杂志》1991年第3期），实际上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1992年出版的《陈直先生纪念文集》，应该说也含有这方面的意义。不过，那时并没有把话挑明罢了。直到纪念陈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时，我在一篇题为《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的纪念文章中（《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才明确地对陈直学做出了解读。2002年初，我在西北大学正式开出了《陈直学》的选课，从而使之作为高校讲坛上的一门课程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年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举行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纪念研究会成立20周年，我特地撰写了《陈直学述略》一文提交大会，希望在同行范围内，就陈直学问题展开讨论。果然，与会学者对此

很感兴趣，讨论相当激烈，赞同者有之，持异议者也有之。事后，龙显昭教授特别对我说：“陈直学的提法是妥当的，希望你尽快写出陈直学的专著来。”对龙教授的鼓励，我非常感谢；但我也会认真考虑不同的意见，采纳其长，以期在我的有生之年最少遗憾地完成这部论述陈直之学的著作。

除了以上四项内容之外，本书还有两个组成部分：“周秦汉唐论”与“书论及其他”。前者收录了有关两周史、隋唐史的几篇旧作，以及2001年后发表的属于秦汉史的几篇小文。后者则是一些书评、书序以及述评类的文字。由于在大的方面它们都可以与本书所论的传统历史文化挂上钩，故而一并收录于此，以免读者翻检之劳。

这册文集所收录的文字，虽称不上什么精品，但却如实地记录了我年过不惑之后曾经走过的学术探索道路。这些也许可以给后来的学子提供某些经验教训，使他们少走或不走弯路。如是，也就是对敝人的最大慰藉了。文集中绝大多数的文章都已发表过，此次结集出版，除改正原印刷错误外，凡被删节的地方，都尽量恢复了原貌。集子中也有几篇小文，是未曾发表过的旧稿，现公布出来，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本文集的编印，还有一层纪念意义，那就是我行将结束在西安东郊浐水之滨居住三十多年的历史，而搬入西大桃园校区的新居，以渡过在职的最后一段时光及退休以后的日子。按中国人的习惯说法，这可称得上是乔迁之喜。尽管面对紧贴喧嚣马路、噪音太大的新居，我并不怎么能喜得起来，但从此毕竟要在一种新的生活环境中来应对余生，所以有一点纪念的表示还是应该的。

衷心感谢西北大学有关校领导及校211办、科研处、文博学院对本书给予的关心和资助！衷心感谢三秦出版社领导对拙作顺利出版所给予的关注与支持！衷心感谢责任编辑贺金娥女

士以及其他相关同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如果没有这些，像这样一册内容极其庞杂的文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便获得出版，那将很难实现。

黄留珠

2004年6月24日初稿

2004年10月2日二稿

2005年6月30日三稿

于西安东郊旧居

##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其影响

说起管理，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泰勒、费尧、韦伯、欧威克、福莱特、梅奥、西蒙等一连串外国管理学的代表人物，感到管理好像只是外国的学问，似乎与中国无缘。其实，这是极大的错觉。殊不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管理智慧与管理思想，它们对现代管理科学具有极大的互补作用，不论从何种视角作考察，其价值较之西方的各种管理理论，并不逊色。

众所周知，经营战略是受到现代管理学界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由于新技术革命和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个正确的、关系到企业前途的全局性的战略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许多精彩的论述与实例。它对今天企业的战略决策，仍具有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强调“庙算”的重要性。“庙算者，计算于庙堂之上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事先筹划、计算，或曰制定战略之前需有全盘而周密的考虑。对于怎样进行庙算，《孙子》有“经五事”、“校七计”之说。“五事”指“道”、“天”、“地”、“将”、“法”。“七计”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经五事”、“校七计”，就是从五个方面（五事）分析研究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并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七计），从而制定战略计划。商

场如战场。在企业管理中，同样也存在一个“经五事”、“校七计”的问题，以此进行企业环境分析，进行企业素质的诊断，最后确定企业经营战略。实践表明，在成功的管理中，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制定战略，《孙子》所强调的因时变化的思想也非常重要。“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而取胜者，谓之神”。所以制定战略决不可一味墨守成规，必须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现代企业的内外环境变化很快，各企业的情况与特点各不相同，因此成功的企业虽有指导其成功的经营战略，但却又无一雷同。对企业家来讲，适应性与应变力是其获胜的关键。

管理科学经过近数十年的发展变迁，其重心已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因为市场的竞争、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单位也好，其兴衰成败，与选人用人或曰人事管理的恰当与否直接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用人之道，内容无比丰富，无数生动事例和精辟论述所蕴含的深刻哲理，迄今仍发人深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管理科学中人事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

知人善任，尊贤重士，求贤若渴，是中国古老而优秀的传统。《墨子·亲士》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荀子·致士》也说：“治生于君子，乱生于小人。”《吕氏春秋·求人》则讲：“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这些论述无疑反映了古今中外的普遍规律。

尊贤重贤固然要看有无识别能者贤士的眼力，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是否对贤者予以任用。春秋时的百里奚，原是虞国大夫，不受重用，才干无由发挥。后来他为秦穆公所得，被委以